



二十世纪

中国百项考古 大发现



100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考古杂志社编著



考古学专刊

乙种第三十五号

二十世纪
中国百项考古
大发现

考古杂志社编著

1054220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刘庆柱主编:考古杂志社编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

ISBN 7-5004-3147-3

I .2...

II .①刘... ②考...

III . 考古发现 - 中国 - 20 世纪

IV .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598 号

特约编辑 苗 霞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装帧设计 毛国宣

责任印制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彩色制版 北京天泽润公司
印 刷 北京经纬印刷厂
装 订 尚艺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mm 1/16
印 张 34
插 页 5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2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 世纪中国考古发现的科学意义(代序)

刘庆柱

20 世纪是中国考古学产生、发展并走向繁荣的时代。为了回顾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总结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展示中国考古学的辉煌成果,推进 21 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杂志,于 2001 年 1~3 月组织举办了“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这项活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考古学家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获得了圆满成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根据评委会的意见,已评选出来的项目将编辑成《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一书出版。

这本书系统介绍的 100 项考古大发现,是从中国 20 世纪数万项考古发现中评选出来的。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没有包括进来。100 项考古大发现虽然仅仅是中国 20 世纪考古发现的一部分,但它们还是集中反映了中国百年考古的概况,可以说是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的缩影。这些考古大发现在国内外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我们举办“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并将评选出来的项目编辑成书,是基于 20 世纪中国考古发现的科学意义,它们主要表现为中国考古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考古学在研究人类起源、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中国历史学框架的全面构筑与深入研究、自然科学技术史的探索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考古学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科学化方面的深刻影响。

中国考古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传统学术向何处去的探索中,产生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时代背景是中国近代

的特定历史环境,其动因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危机与国外新思想、新文化的传入及影响,其契机是考古学的传入中国和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经卷与文书的考古发现,其学坛代表人物是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科学地结合起来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我们可以说,没有考古学的传入,没有殷墟甲骨文、敦煌经卷文书与汉晋简牍的考古发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无从谈起,“新史学”就无从谈起,完成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可能还要待以时日。从某种角度说,“新史学”的产生是基于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对继“新史学”而出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更为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郭沫若先生就是利用商周考古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杰出代表。

人类起源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十大科学课题之一,20 世纪中国的考古发现为推进这一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学术界关于人类起源的研究,目前仍以人类东非起源说为主。20 世纪以来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向上述传统理论和观点提出挑战。距今 200 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安徽繁昌人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云南元谋上那蚌均有考古发现,这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突破,对世界考古学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在探索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人类起源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距今 100 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以陕西蓝田公王岭、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群为代表。70 万年以来的直立人文化遗存已发现了 150 多处,分布在北京、山东、辽宁、内蒙古、陕西、甘肃、四川、河南、湖北、安徽、江苏、贵州、湖南、广西等地。早期智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在山西、陕西、辽宁、广东、安徽、湖北、贵州等地已发现 30 多处。距今 4 万年至 1.2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在中国各省、自治区均有发现。中国旧石

器时代考古学研究表明，在现代中国版图范围之内，虽然因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而导致人们的生活、生产内容不一，但是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在体质人类学上具有的一脉相承特征，仍然反映了他们是连续不断进化的。这些考古发现对探讨人类起源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进一步否定了“上帝造人”的唯心主义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即国家出现)是近年来世界学术界倍加关注的课题，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它与“人类起源”同属于最为重大的科学课题。像“人类起源”课题一样，“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也有“一元”与“多元”之不同说法。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而言，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就有“传播论”与“独立演化论”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如德国人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法国人约瑟夫·德·齐尼(Joseph de Guignes)、英国人理格(James Legge)等认为，古代中国人就是从西方、埃及或土耳其等地传入东亚的。也有一些欧洲学者通过文字、考古遗物等的对比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在近东。近年来更多学者认为，古代世界各地的文明虽然有着相互影响，但仍存在着不同的原生文明。如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认为，古代世界的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玛雅六大文明是独立起源的。亨利·佛克福特(Henri Frankfort)则将上述六大文明归纳为独自产生于近东、中国和中南美地区的三大古代文明。由于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一般没有直接历史文献可资借鉴，考古学资料就成为探讨这一课题的主要依据。20 世纪的中国考古发现，恰恰在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如距今 12000~9000 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江西万年仙人洞与

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等考古发现，已出土了原始陶器、磨制石器，并在仙人洞与吊桶环、玉蟾岩等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等考古发现中，农作物增加了粟和黍，猪、狗、牛、羊、鸡等成为家畜成员，玉器、白陶、彩陶再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骨笛、陶祖、契刻龟甲折射出先民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章丘城子崖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遗址，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遗址等考古资料揭示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包括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黄河上游、辽河流域、太湖地区等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这时已经基本形成。在晋南、豫西出现的大型城址、墓地，与历史传说、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和夏王朝中心活动区相一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等的考古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研究。20 世纪中国的考古发现，成为奠定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科学研究的基石。从考古学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特点，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原生文明，不同于地中海文明和中南美洲文明。由此我们也认识到，现代世界多元文明的历史基础，正是因地理、气候等多种自然、社会因素和文化传统而形成的多元的世界古代文明。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从 20 世纪的中国考古发现中，得到充分反映。如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新疆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墓地，吉

林集安高句丽墓地，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内蒙古东部的辽代墓，宁夏银川西夏王陵，西藏古格王国遗址等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无不反映出周边与内地密切的文化关系。华夏文化也就是在不断吸收周边地区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得到迅速、健康发展，使之成为多元一体的华夏文化。20 世纪的中国考古发现，揭示了华夏文化作为世界上惟一一种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文化，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精神基础。

华夏文化之所以有着强大生命力，历经几千年而不衰，还在于它的开放性。如甘肃敦煌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等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南亚、中亚佛教文化的东渐，以及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又如陕西西安北周安伽墓、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和其他中国境内“昭武九姓”墓葬的考古发掘，以及中国各地出土的外国钱币、金银器、玻璃器等，再现了古代中外交流的繁荣局面。文化交流促进彼此的发展，古今中外概莫如此。20 世纪中国考古发现说明，中外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汉唐时代的出土文物和遗迹，是中国考古学上反映中外文化交流最广泛、最丰富、最全面、最深刻的历史资料，而汉唐王朝恰恰又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两个王朝，号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 20 世纪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上述历史规律，无疑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考古学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性，人类历史越早，这种重要性越突出。由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著名的《剑桥中国史》，在其编写出版之始，由于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史前与先秦时期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致使其不得不最先推出秦汉史卷。20 世纪中国史前考古的诸多发现和研究，奠定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

学术地位，使中国史前史的建立成为可能，填补了中国史前史的空白。传统的夏商王朝的历史，因为夏商考古的大量重要发现而变得丰富多彩。过去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建立的周秦汉唐历史，也因为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而需要重新研究。大量的重要考古资料已经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研究内容，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过去所形成的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格局，因不断出现的考古大发现而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其中古代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古代都城被认为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中国历史上的主要都城遗址，几乎均开展了考古工作，如夏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和安阳殷墟遗址；周秦汉唐时期的都城遗址有陕西西安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都城遗址、河南新郑东周郑韩故城遗址、河北易县东周时期燕下都遗址、湖北江陵东周纪南城遗址、陕西咸阳秦咸阳城遗址、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遗址、河北临漳曹魏—北朝邺城遗址、陕西西安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河南洛阳隋唐洛阳城遗址、北京元大都遗址等。基于近代自然科学技术而产生、发展的考古学，其理论和方法也促使狭义历史学更加科学化。中国考古学对于中国历史学的重要性，将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越来越显示出其考古发现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不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离不开中国考古学新的发现与研究。

自然科学技术与人类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中我们特别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作为以古代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遗物、遗迹等遗存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是探索自然科学技术史的最重要学科。中国 20 世纪的考古大发现，几乎无处不反映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

发展。如远古人类化石及其相关遗存的发现、农业和家畜的起源、陶器和金属器的出现、湖北铜绿山矿冶遗址、河南南阳等地的汉代冶铁遗址、浙江南宋龙泉窑遗址等古代瓷窑遗址、历代水利工程遗址、各种各样的古代建筑遗址的发现以及与古代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密切相关的考古发现的遗物，无不再现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这些考古发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聪明、智慧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许许多多令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科技发明，在不少重要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曾经领先于世界。可以说，古代中国对世界古代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为自己祖先的历史功绩感到骄傲和自豪！

以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为前提，以生物学、地质学学科方法为基础，以研究人类历史为目的诞生的考古学，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最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已不仅限于生物学的类型学、地质学的层位学，而是扩及自然科学技术的诸多领域，如年代学的碳十四（常规与加速器

质谱）方法，人骨的碳十三食性分析，分子生物学的 DNA 遗传工程，古代遗物的物理与化学分析技术，考古勘探中的遥感技术与线层物探之地球物理方法，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在考古工作中的推广。这些不只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信息，而且为考古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方法，极大地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现代化、科学化。

当然，20 世纪中国考古发现的科学意义远不止以上所述。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近代考古学虽然还很年轻，但它是当今最有生命力的学科之一，它已成为现代学术中的“显学”。在新的世纪，随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更为广泛应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结合，考古工作领域从内地到边疆、从陆上到水下，时间上从远古旧石器时代到元、明王朝，将全方位展开，中国考古学将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更多更精彩的考古发现将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为推动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Foreword: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of China'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a period when archaeology was born, developed and became flourished in China. From January to March, 2001, in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new millennium, the *Kaogu (Archaeology)* journal,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rganized a campaign to select "One Hundred Most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This campaign is committed to reflecting a centennial history, to displaying the dazzling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o promoting her further development. Thanks to the enthusiastic responds and full support of archaeologists all over China, this campaign was concluded with a great success. The result was also well received by other social group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uggestion of the campaign committee, the selected result has been compiled as this book *100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100 discoveries, systematically recorded in this book, were selected from thousands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For various reasons, some important discoveries could not be included. These 100 discoveries are only pa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China; nevertheless they reflect a general scenario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past century.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y represent the epitom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These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d great social impact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they bear significant scientific value, therefore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The selec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se 100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Archaeology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es in China. It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studies of the origin of humans,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fied Chinese empire with multiple nationalities, and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t also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ll structures of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and the researches into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and exerted a potential influenc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Chinese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archaeology was very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cademics in China.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academics to modern academics in China happen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is was a special period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en they debated where China should go and where Chinese academics should go.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approaches, an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hought and culture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motivated to change. The change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archaeology into China, the discoveries of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t Yinxu, Anyang, and the finds of texts and manuscripts at Dunhuang.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 was Wang Guowei who combined scientific archaeology with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searches. It is not exaggerating to say that, without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archaeology and without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at Yinxu and Dunhuang, there would be no Wang Guowei's new approach of "Double Evidences," nor the born of "New Historical Studies," therefore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academics to modern academics in China would have been further postponed.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born of "New Historical Studies"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e bor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were more crucial to the Marxist historical studies in China. The pioneer Marxist historian Guo Moruo was a representative who appli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o study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origin of humans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10 major scientific subjects in the world today. Chines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advance the research of this issue. To the present, the majority of scholars believe that modern humans originated in East Africa. However, th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challenged this orthodox hypothesis. Paleolithic cultural remains of ca. two million years ago were found at Renzidong in Anhui Province, at Longgupo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and at Shangnabang in Yunnan Province. These discoveries are breakthrough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e also significant to the world archaeology. They are important materials to study the appearance of humans in Asia, especially in East Asia. The Paleolithic cultural remains of ca. one million years ago were recovered in many places such as Gongwangling in Lantian of Shaanxi Province and Nihewan in Yangyuan of Hebei Province. More than 150 sites or localities of *Homo erectus* no later than ca. 700,000 years BP were found in Beijing, Shandong, Liaoning, Inner Mongolia, Shaanxi, Gansu, Sichuan, Henan, Hubei, Anhui, Jiangsu, Guizhou, Hunan and Guangxi. The late Paleolithic remains of 40,000-12,000 years ago have been found all over

China. Th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demonstrate that, within the boundary of modern China, there was a physical continuation from *Homo erectus* to *Homo sapiens*, although their cultures were different due to different regional environments.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thes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o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humans can not be overstated.

The origi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state have drawn great attention from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This issue is as important as the origin of humans. Like the subject of the origin of humans, the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also include "singular original center model" and "multiple original centers model." There had been diffusionism and independent evolutionism to interpret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a long time. F. Von Richthofen of German, Joseph de Guignes of French and James Legge of British believed that ancient Chinese were immigrated from the West, Egypt or Turkey. Other European scholars,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written characters and cultural remains, proposed that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Near East. Recently, most scholars argue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t pristine civil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ough they were influenced by each other. Glyn Daniel, a distinguished British archaeologist, proposed that the six major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Mesopotamia, Egypt, India, China, Mexico and Maya were originated independently. Henri Frankfort combined the above six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to three: the Near Eastern, the Chinese, and the Meso- and South American civilizations. Due to the lack of direct historical document, the main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come

from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e research of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early Neolithic period (ca. 12,000-9,000 BP), the cultural remains include early pottery and polished stone tools were recovered at the Xianrendong site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the Yuchanyan site 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 Nanzhuangtou site in Hebei Province. In addition, the earliest cultivated rice in the world was found at the former two sites. In the middle Neolithic sites, such as Peiligang and Jiahu of Henan, Dadiwan of Gansu, archaeologists recovered remains of cultivated millet and broomcorn millet. The domestic animals included pigs, dogs, cattle, goats and chicken. The jade artifacts, white pottery and painted pottery indicated the development of handicraft industry. The bone flutes, ceramic phalli and inscribed turtle shells reflected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life of the early people. The late Neolithic cultures, represented by the Yangshao site in Henan, the Banpo site in Shaanxi, the Dawenkou site and the Chengziya site in Shandong, the Liangzhu site in Zhejiang, the Majiayao site in Gansu, the Liuwan site in Qinghai, and the Niuheliang site in Liaoning provinces, indicated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gral cultural unity with multiple provenances in China. This unity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entral Plain, including the Haidai area,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reaches of Liao River and the Lake Tai area. A number of large city-sites and cemeteries at the southern Shanxi and the western Henan were accord with the living areas of the legendary "Three Emperors and Five Kings" and the core area of the Xia Dynasty.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t the Taosi site in Shanxi, the

Wangchenggang site and the Erlitou site in Henan greatly promoted the research of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have become the corner stone for the researches into the 5,000 years Chinese civilizatio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istine Chinese civilizat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ivilizations in Mediterranean area, in Meso- and South America. Therefore, we com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the multiple modern civiliz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the multiple ancient civilizations developed under different natural and social contexts.

From ancient times, China has been constituted by multiple nationalities. The Huaxia culture, consists of cultures of many ethnic groups, was fully reflect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land and the peripheries was demonstrated b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t sites such as the Xiajiadian site in Inner Mongolia, the Shang tomb at Dayangzhou in Jiangxi, the Sanxingdui site in Sichuan, the Shizhaishan graveyard in Yunnan, the Loulan site, the Niya site, and the Astana-Halahezhuo graveyard in Xinjiang, the Koguryo graveyard in Jilin, the Longquanfu site in Heilongjiang and the Liao period tomb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the Western Xia period royal mausoleum in Ningxia and the Guge Kingdom site in Tibet. Huaxia culture developed rapidly and healthily by constantly absorbing peripheral cultures, and eventually formed an integral cultural unity with multiple provenances.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have demonstrated that Huaxia culture is the only culture with unbroken continu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is has become the

spiritual foundation for the united nation with multiple nationalitie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Huaxia culture has lasted thousands of years with great vitality is her openness. The diffusion of Buddhist cultures into China from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nd their mingling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were reflect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t the Dunhuang Grottoes in Gansu, the Longmen Grottoes in Henan, the Datong Grottoes in Shanxi, the hoard of Buddhist statues at the Longxing Temple in Shandong, and the pagoda foundation of the Famen Temple in Shaanxi.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e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t the Northern Zhou period Anjia's tomb in Shaanxi, the Sui period Yuhong's tomb in Shanxi and other minority's tombs in the territory of China, and in the finds of foreign coins, gold and silver wares, and glass artifacts in China. It has proved to be true that cultural exchange promotes mutual development over the history both of China and of the world.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demonstrate that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s of the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were also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Han and the Tang dynasties demonstrate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se two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dynastie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ere also flourished.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re known as the "Golden Ages"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significance of archaeology to historical studies has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earlier the history, the more important archaeology is. Because of the continuous rich ar-

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prehistoric and pre-Qin Dynasty perio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famou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had to firstly organize the volume of Qin-Han period to introduc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re the fundamental basis to reconstruct Chinese prehistory.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Xia and the Shang dynasties have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Many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Zhou, Q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written documents before, have been or need to be revised in light of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e large amount of unearthed materials has enriched historical researches, and changed views on a number of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apital cities has provided important materials to study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most capital sites of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such as the Erlitou site of the Xia Dynasty, the city site at Yanshi, the city site at Zhengzhou, and the Yinxu of the Shang Dynasty in Henan Province; the Feng and Hao capital site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Shaanxi Province; Jin State capital site of Eastern Zhou in Shanxi; Zheng and Han states capital site of Eastern Zhou in Henan; Yan State lower capital sit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Hebei; Ji'nan city site of the Chu State of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in Hubei; Chang'an city sit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Shaanxi; the Luoyang city site of the Han and the Wei dynasties in Henan; the Yecheng city site of the Cao Wei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nd Northern Dynasty in Hebei; the Daxing city site of Sui Dynasty and the Chang'an city site of the Tang Dynasty in Shaanxi;

the Luoyang city site of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ies in Henan; and the Dadu city site of the Yuan Dynasty in Beijing. The archaeological methods and theories, initiated and develop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odern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have expanded and continue to prompt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tudies. It is doubtless tha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will play essential role in the researches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fu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had contributed in many aspects to human civilizations, and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partly reflected 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So far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controlling fires by humans is found at Zhoukoudian Locality 1. A number of discoveries indicate that China is the center for the origin of rice agriculture and millet agriculture, and is also one of the centers for the earliest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Ancient Chinese people also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n metallurgy. The bronzes of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re the most splendid bronze art among all ancient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Tonglushan site of copper mining and melting in Hubei Province and the Han Dynasty iron-melting site at Nanyang in Henan Province provide evidence to study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metallurgy in ancient

China. Oth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such as manufacturing of porcelains, the controlling of flood, and the building of magnificent architectures, to give just a number of them, are also reflected 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many kiln sites, flood-control project sites and architectural remains. It is these great achievements that made modern Chinese people proud of their ancestors!

Nevertheless, the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of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cannot be fully covered by the above discussion. It is not exaggerating to say that, in the past century, archaeology w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disciplines in China. Although archaeology is still young in China, it has become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 distinguished discipline.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new millennium, Chinese archaeology not only will widely adopt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ut also will actively interact with other social sciences. The regional covering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have been extended and will continue to cover areas from inland to frontier and from land to underwater. The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archaeology has accommodated and will continue to include periods from Paleolithic period to the Ming Dynasty. It is doubtless that Chinese archaeology will continue to mak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nd greatly contribute to the progression and prosperity of science and culture.



Liu Qingzhu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June 17, 2001

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述评

● 白云翔

一、引言

1-1 20世纪已经成为过去，21世纪人类历史的篇章正在揭开。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巨变的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风云变幻与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艺术空前繁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19世纪后期形成于欧洲的近代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传到中国，吸收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有益成分，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实际相结合，诞生了有东方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在有着近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近代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一经诞生，便表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在20世纪的百年间，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从萌芽、发生到蓬勃发展的历程，并于世纪末进入了“黄金时代”。

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是同考古发现相伴随的。远古以来人们遗留下来的古物的被发现，引发了人们对古物收藏、研究和根据古物探究古代社会奥秘的兴趣，从而刺激了考古学的出现和形成；而随着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古物和古迹被考古学家不断从地下挖掘出来，并且被考古学家通过各种科学的手段和途径进行分析和考察，用来阐释那已经逝去的遥远的过去。于是，考古发现的数量、内涵和科学性便成为考古学发展水平和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中国的考古发现，既折射出中国考古学近百年间从诞生、成熟到蓬勃发展的辉煌历程和巨大的成就，更从中展现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明。正是基于对20世纪中国考古的回顾、总结和成就的展示，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举办了，100项考古大发现被评出来了。这100项大发现不仅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都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过深远的社会影响，应当说是“世纪大发现”。它们是

20世纪数以万计考古发现的代表，它们是20世纪考古发现的缩影。

然而，代表只是其佼佼者，缩影毕竟不是全景。在这100项大发现之外，20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还有很多很多，并且都具有其特有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在了解100项大发现的同时，还应当对其他重要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有所了解。我们认为，把一项考古发现作为一个单元加以认识是必要的，而把所有的考古发现作为一个整体放到历史的长河和古代文明的洪流中加以审视，同样是必要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里就20世纪的考古发现从整体上加以回顾，对100项大发现以及其他重要的考古发现加以总体的说明和历史的观察。

1-2 何谓考古发现？一般说来，考古发现是指有关古代人类、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的实物资料的发现，并且这些发现是有其科学价值的考古学的发现。

我们知道，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在亿万年的宇宙演进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属于自然界的范畴。而人类出现以后，便开始了人类活动的历史。人类的活动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但人类活动的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过去。不过，人类活动中制造或形成的各种实物，包括人体本身和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物，却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态被保留了下来。古代的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必须制造生产工具，又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和使用各种生活用具，其中有些工具和生活器具因使用破损而被丢弃或因其他原因被保存了下来。当然，这些工具和生活器具等大都被埋在了地下，今天从地下被发掘出来，便成为考古学上的“文化遗物”，即“遗物”。另一方面，人们在制造和使用各种工具、生活用具、兵器等可以移动的物品的时候，还在生产活动和

社会生活中建造了各种设施，如埋葬死者的坟墓，用来居住的房屋，用于防御的城堡等。它们的绝大部分都因毁坏而被埋在了地下，或在地上遗留下了残垣断壁，今天从地下被发掘出来或被找到，便成为考古学上的“文化遗迹”，即“遗迹”。此外，人们在各种活动中还把与生产和生活发生过联系的自然物的遗骸遗留了下来，如人们食用肉类后遗弃的动物骨骼，利用自然植物后遗留的植物籽实和秸秆，出于某种需要从他处采伐来的木材、搬运来的石头等，今天从地下发掘出来，便成为考古学上的“自然遗物”。至于人的躯体，其本身虽然因自然腐朽而无法保存下来，但人体的骨骼却往往因“石化”成为化石或因埋藏在地下而被保留了下来，同样成为考古发现的重要内容。古代人们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以及自然遗物和人体骨骼本身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是人们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范围内从事各种活动中形成的，于是，包含有遗物、遗迹以及自然遗物乃至人体骨骼遗存的某一人类活动的地点，在考古学上称之为“文化遗址”，即“遗址”，而这些相关的遗物、遗迹和遗址，又被统称为“文化遗存”。这些古代的文化遗存通过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被寻找和发掘出来的过程及其本身，便是“考古发现”。

需要说明的是，考古学上经常使用的“文化”一词，一般不是特指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精神财富，而是指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一定的人类集团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考古学专业术语的“考古学文化”，则是表示在考古学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即指在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同一地区，具有共同特征的一批遗存。考古学文化，尤其是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存，一般用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名给予命名，如仰韶文化；有时也以其最富有特征的遗迹或遗物进行命名，如细

石器文化等；历史时期的遗存，又往往用朝代名或民族名以称之，如商文化、匈奴文化等。

任何古代文化遗存，都是人们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自然环境、一定的社会组织条件下，通过人们的智慧和双手而形成的，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地域的印记，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和技术的内涵。正因为如此，通过对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实物资料的研究，可以了解甚至复原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科学技术水平，进而寻找人类活动的发展和演变轨迹，探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这便是考古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考古学的任务所在。所以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去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1-3 在我国，有着收集和著录古物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就出现了以著录和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当时的金石学家对收藏于皇室和流散于民间的古器物 and 碑刻进行收集和整理，摹写其图像及其铭文刻辞，记录它们的尺寸、容量或重量，以及收藏地和出土地，并对其用途、年代和铭文内容等进行一定的考证。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吕大临编撰成书的《考古图》、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王黼编纂成书的《宣和博古图》，就是宋代金石学著作的代表，也是现存年代最早且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金石学经过元明两代的缓慢发展，到清代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尤其是乾隆以后，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金石学更是大为发达，对古器物不仅精于鉴别，详于考证，而且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清代的金石学家搜集的铜器铭文、碑刻、钱币及玺印等铭刻资料更加丰富，文字的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出现了《金石索》

12卷（成书于嘉庆末年）等大量综合性古器物图谱以及各种专门的著作，造就了一大批金石学家。清末民国初年出现了罗振玉（1866～1940年）、王国维（1877～1927年）等集大成的金石学家。传统的金石学，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前奏。

金石学毕竟不是考古学，我国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的。就世界范围来说，考古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的欧洲。18世纪后期，被称为“考古学之父”的德国人J.J.温克尔曼根据保存在罗马等地的古代艺术品资料写成了《古代美术史》。尽管古代美术史并不等于考古学，但他毕竟揭开了利用古代遗物研究古代历史的序幕。19世纪初的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人开始了在埃及、意大利等地的古迹古物调查和发掘。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C.J.汤姆森从史前时期的古物出发，提出著名的“三期论”，认为史前时代的丹麦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此后，“三期论”被应用于田野考古，1843年J.J.A.沃尔索发表《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使“三期论”成为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直到今天，“三期论”仍被全世界考古学界所采用。19世纪中叶，田野考古在欧洲和埃及逐渐展开。1866年，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在瑞士召开，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承认，标志着近代考古学真正形成。

近代考古学形成以后，逐渐成熟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发展开来。19世纪末，乘西学东渐之风，考古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一书中论及西洋史学思想的特点之一是根据古迹古物研究古代历史。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更是对C.J.汤姆森的“三期论”进行了介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1898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被当作中药材的所谓“龙骨”上发现了契刻文字，从而发现了甲

骨文。1900年，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无意中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个尘封数百年的长宽仅3米左右的小窟——藏经洞，洞中发现了四五万件从三国至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佛画和法器。这两项近代学术史上的著名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另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和瓜分，日、俄、英、德、法、瑞典等国的考察队纷纷来到中国，以考古探险为名，行刺探情报、掠夺文物之实，到东北、内蒙古、甘肃、新疆等我国的边疆地区进行破坏性的挖掘，发现并劫掠了大量珍贵文物，成为中国考古发现史上沉重的一页。

进入20年代，中国考古学终于艰难地迈出了自己的步伐。1921年，北洋政府聘任的矿产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J.G.安特生等人在北京周口店发现龙骨山遗址，采集到的脊椎动物化石中发现有1枚人科动物的牙齿化石，引起学术界关注。1921年，安特生等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发掘^{*}，发现了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按照以发现地点命名的原则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真正的考古发掘，也是新石器文化的首次考古发现。1923年，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主任的金石学家马衡等人，到河南孟津、新郑等铜器出土地以及洛阳汉魏故城太学遗址进行了察看。1926年，留学美国归来的李济为实施清华学校研究院和美国佛里尔美术馆的合作研究，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发掘。这次发掘虽然具有国际合作性质，但毕竟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曾约请中国学者一起在辽宁的旅大地区发掘了单砣子遗址。同年，以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徐旭生）为中方团长、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为瑞方团长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开始了在内蒙古和新疆等地长达6年的包括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在内的科学考察。

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美国主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合作，开始在周口店进行发掘。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学组，并开赴河南省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调查和发掘。安阳殷墟的调查和发掘，是中国的学术机构、中国学者自主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近代田野考古，于是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由此也真正拉开了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的帷幕。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一经诞生，便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并在考古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继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成立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于1929年相继成立，成为当时中国考古的主要机构和力量。1928~1937年的近十年间，中国考古取得了惊人的发现。安阳殷墟连续进行了15次发掘，发现了大量大型建筑基址、王陵、祭祀坑以及2万多片甲骨等大量珍贵文物。1929年，在裴文中主持下，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又发现了大批石器以及人类的用火痕迹，确认了北京人的文化。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在周口店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1930年，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发现了一种以磨光黑陶为突出特征的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1931年秋，在国外专攻考古学的梁思永主持安阳后冈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发现并判明了著名的“三叠层”^{*}，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标志着中国田野考古的成熟。1930年，在马衡主持下对河北省易县燕下都进行了发掘调查。1933~1935年间，在徐炳昶领导下于陕西省宝鸡斗鸡台附近发掘了仰韶文化遗址和周秦汉代的墓葬，后来苏秉琦应用考古类型学对斗鸡台沟东区周秦墓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1934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和1936年杭州市余杭良

渚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长江下游地区以黑色陶器为突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后来被命名为“良渚文化”。这一时期的重要田野考古，还有山东日照两城镇、河南永城造律台等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东南沿海和港台地区的考古调查，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战国时期魏国墓葬的发掘，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以及1万多枚汉代简牍的发现，新疆地区众多汉唐时期古城址、墓地、寺庙等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南京六朝陵墓、四川广汉地区的考古调查，河北省邯郸附近响堂山石窟的详细勘查，另外还有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正当考古学在各地蓬勃兴起之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中断了中国考古学的正常发展，考古发现进入低潮。1937~1949年的十多年间，中国考古学在战乱中艰难地跋涉。1939~1943年间，进行了云南大理附近史前遗址和南诏遗址的发掘，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成都附近前蜀王建墓的发掘，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考古调查等。1944年，夏鼐在甘肃省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学上证明了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从而纠正了安特生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上的错误。1947~1948年，裴文中等在甘肃、青海进行史前遗址调查。解放战争时期，民主政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墓、邯郸附近的汉墓进行了发掘。另外，日本人在东北、华北等占领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1949年文化部文物局设立，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并立即组团赴河南辉县等地进行发掘。此后，各种文物考古机构相继建立，考古队伍迅速壮大，中国考古学进入蓬勃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考古工作以配合

国家重点建设为重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广泛展开。在对各地的古遗址进行普遍调查的同时，对重点遗址和墓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陕西蓝田人和云南元谋人化石的发现，把我国古人类的出现上溯到100多万年前；柳江人、马坝人等人类化石的发现，把我国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地域扩展到华南地区；同时还发现了襄汾丁村、芮城匭河和西侯度、朔县峙峪、安阳小南海等一批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等遗址的发掘，把仰韶文化研究推向高潮；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淮安青莲岗、浙江嘉兴马家浜、上海青浦崧泽、重庆巫山大溪、湖北京山屈家岭等遗址的发掘，命名了一批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夏代后期的文化遗存及都城所在；郑州二里冈遗址的发掘以及郑州商城的发现，确认了商代前期的文化遗存和都城；安阳殷墟恢复发掘并取得重要成果；丰镐遗址及张家坡西周墓地、上村岭虢国墓地、东周列国都城等都进行了有计划的勘探和发掘；赤峰夏家店、平度东岳石等遗址的发掘，确认了夏商周时期当地的青铜文化。秦汉至元明时期的城址、墓葬、佛教遗迹、瓷窑址、冶铸址等都有不少重要发现，如对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大兴—唐长安城、隋唐东都洛阳城等都城及渤海上京龙泉府等地方政权的都城址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发掘；洛阳烧沟、长沙地区、广州地区汉墓的发掘，建立了当地汉墓的年代序列；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地的发掘，确认了西汉时期的滇文化；白沙宋墓，是宋代墓葬的首次科学发掘；北京明代定陵，是惟一一座经过科学发掘且保存完整的古代帝陵。1966年爆发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出现了暂时的停滞，但考古发现并未完全中断。如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汉墓，是保存

完整的汉代诸侯王陵的首次发现；陕西咸阳杨家湾汉高祖长陵两座陪葬墓，山东曲阜九龙山西汉鲁王墓，唐昭陵、乾陵一批陪葬墓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首次发现了汉代软体女尸，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大量珍贵汉代简牍；安阳殷墟、隋唐洛阳城、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勘探和发掘都有不少重要发现，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200多件。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三种学术杂志率先复刊，考古工作开始逐渐恢复，重大考古发现日渐增多。如对临潼姜寨、余姚河姆渡、曲江石峡、沈阳新乐、密山县新开流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并新命名了一批新石器文化；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包括5041片刻辞甲骨在内的7000多片甲骨、殷王武丁配偶妇好墓的发掘，把殷墟考古推向一个新阶段；青海柳湾、敖汉旗大甸子、宝鸡茹家庄等墓地及黄陂盘龙城等遗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秦都咸阳城开始进行大规模发掘，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震惊中外……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考古学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走向了繁荣，进入“黄金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国考古百花园争奇斗艳。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以探索重大学术课题为目的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更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考古发现呈现在人们面前，不胜枚举……可以说，20世纪中国考古的巨大成就，绝大部分是20世纪的后50年间取得的。

20世纪众多的考古发现，生动地描绘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形象地再现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光辉与灿烂，把现代的人们带回到了那已经逝去的遥远的过去。